

杜威在華演講及其影響

吳俊升

一九六四年秋季，本文作者應夏威夷大學東西中心 (East-West Center, University of Hawaii) 之聘參加資深學者研究計畫。我所研究的專題即是杜威對於中國思想與教育的影響。同時並和同在東西中心研究的夏威夷大學教育系主任 Robert Clifton 博士，共同商訂杜威在中國的全部講演的英譯計畫，並著手翻譯。當時助理譯事的還有臺灣師範大學畢業正在夏大研究院研究，後來轉入加拿大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現在加拿大大學任教的呂聰明教授。我在中心駐留五個月。除共同譯成杜威在華一部分演講而外，並寫成對東西中心的報告論文一篇。原題為 “Dewey's Sojourn in China: His Lectures and His Influence on Chinese Thought and Education” 我在東西中心研究時，適會美國南意大利諾大學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一羣杜威學者有重刊杜威全部著作計畫。對於杜威在華演講，甚有興趣，邀我前往訪問，參加出版意見。後來杜威著作由該大學分年出版。今年出

版一冊「杜威著作導讀」，(Guide to the Works of John Dewey) 其中有一章為我所作，名為 “Dewey's Lectures and Influence in China” 即是由上邊所提及的報告節寫而成的。關於杜威在華演講的英譯，經過幾年的繼續進行，已經大部完成。其中關於政治及社會哲學和教育哲學兩大演講，正在夏威夷大學出版部印刷中。在該課本的導言中，也採用了上述的報告一部分。但是上述報告迄今尚未用中文發表。今年欣逢中華民國開國六十週年。東方雜誌徵文紀念。我以為在開國六十年中，杜威來華演講就其影響而言，實是一件大事，所以便把原報告全文用中文改寫，以充東方雜誌的篇幅。至於原文原為外國人而寫，雖經以中文改寫取材與詞氣，難免有不切合本國讀者之處，想蒙察諒。

一、杜威訪華的經過

史裡是一件極重要有意義的事。可是中國人由於對於他的影響已經十分熟悉，懶得對於它作價值的估定，甚至也沒有對於杜威的來華經過及其影響，作詳明的紀述。在美國人方面，對於杜威在華的停留，也少加注意。這或者是很自然的；因為杜威對於全界的影響是太大了，要美國人特別注意到他在華短期的停留，本是很難的。可是中國是杜威在國外發生最大影響——尤其是在教育方面——的一個國家，乃是無可置疑的。

直到十多年前，當中共開始清算杜威的中國門徒，以期根絕杜威在中國知識界的影響時，西方才開始覺察杜威對於現代中國有極大的影響。一九五九年第三次東西哲學家會議在夏威夷大學舉行時，胡適在一公開演講中，便會指述杜威在華短期居留的意義和重要性。在胡適演講以後，美國學者也對於杜威的訪華，他的在華演講，和他對於中國文化潮流的影響，逐漸增加了興趣。夏威夷大學東西中心鼓勵這方面的研究，並協助杜威在華演講的英文翻譯和出版，便是對於杜威

在華這一段的訪問和演講發生興趣的一種表現。雖然杜威思想，尤其是教育思想，在美國正受檢討和嚴格的批判，而處於低潮時期。

當一九一九年杜威在東京帝國大學演講時，他受了中國五個學術團體的聯合邀請來華，在北平南京及其他城市演講。這聯合邀請乃是杜威的學生所促成的。這些學生是北京大學教授胡適，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郭秉文，和新教育雜誌的主編蔣夢麟。杜威接受了這邀請，偕同他的元配夫人 Alice Chipman 於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抵達上海。那正是五四運動發生的前三天。他一抵達上海以後，便在江蘇省教育會講民主主義與教育的關係。在訪問了杭州和南京並作短篇演講以後，便赴北平定居下來。第一大部分的時間用在幾套公開的演講方面。除北平而外，也會到其他城市。他停留了將近一年以後，對於中國發生濃厚的興趣，遂受中國朋友們的敦勸，決定在中國再留一年。在第二年內，他除了零星的演講而外，在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和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正式授課。他並在沿海各城市演講。足跡遍及奉天、直隸、山西、山東、江蘇、浙江、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廣東、等省。

杜威每到一處均受教師、學生、知識分子、政府和社會領袖、以及一般民衆的熱烈歡迎。他到每一場合，都樂意和民衆接近。他曾留有一張手抱着一個幼童的相片。在他訪問時期，他的名字，老是和同時在華訪問及演講的羅素的名字聯在一起。他們的大名是中國當時每一大城市的每一受教育的人士個個耳熟的。

在一九二〇，北京大學給予杜威以名譽博士學位。他在留華期間和他的夫人和他們的小姐 Evelyn Dewey 通訊，報告在中國的情形。這些書信，後來收入在 Evelyn 所編的「來自中國和日本的書簡」(Letters from China and Japan) 一書中出版。杜威同時也在美國的雜誌「新共和國」(The New Republic) 和「亞細亞」(Asia) 發表了有關中國的論文。這些論文收入後來出版的「人與事」(Character and Events) 一書中。

杜威和他的夫人在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一日離開中國，仍回哥倫比亞大學任教。他們一在中國停留了兩年，兩個月和十天。

二、杜威的演講

杜威在華的演講可分系統的演講和短篇的演講兩大類。系統的演講共有十種。短篇的演講可考的有五六十個標題。現在分記如下：

(一) 系統的講演

系統的講演係分在北平和南京兩地舉行。在北平的有下列七種：

1. 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共十六講，
2. 教育哲學共十六講，
3. 倫理學共十五講，
4. 思想的派別共八講，
5. 現代三個哲學家共三講，
6. 現代教育之趨勢共三講，
7. 美國民治之發展共三講。

杜威在南京的系統講演，有下列三種：(各

分幾講，原記錄不明晰)

1. 教育哲學，
2. 哲學史，(限於蘇格拉底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
3. 試驗論理學。

(二) 短篇的講演

杜威在北平與南京作系統講演而外，並在若干大城市作短篇講演。其有記載可考的，有下列各講題。他的講演所涉方面之多，從這些講題可以看出的。

1. 平民主義與教育，
2. 平民教育的真諦，
3. 學問之新問題，
4. 實業教育論，
5. 學生自治，
6. 品格修養成爲教育的無上目的，
7. 學校與鄉村，
8. 大學與民治國輿論的教育，
9. 西方思想中之正義觀念，
10. 新人生觀，
11. 社會進化之標準，
12. 教育家之天職，
13. 教育與社會進化，
14. 自由的真義，
15. 智慧測量方法大綱，
16. 自動之真義，
17. 職業教育的精義，
18. 職業教育與勞動問題，
19. 男女同學問題，

- 20 專門教育的社會觀，
21 公民教育，
22 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的關係，
23 社會進化，
24 德謨克拉西的真義，
25 工藝和文化的關係，
26 教育與社會的關係，
27 社會進化問題，
28 教育的新趨勢與教材改組，
29 教材的組織，
30 教育與實業，
31 小學教育之趨勢，
32 教育行政之目的，
33 學校與社會，
34 學生自治的組織，
35 試驗主義，
36 論中國的美術，
37 大學的旨趣，
38 教育者為社會領袖，
39 自動與自治，
40 美國教育會之組織及其對於社會的影響，
41 教育與國家之關係，
42 教訓青年之教育原理，
43 南游心影，
44 國民教育與國家的關係，
45 自動的研究，
46 教師職業之現代機會，
47 天然環境社會環境與人生的關係，

- 48 習慣與思想，
49 動的道德重要的原因，
50 科學精神與道德，
51 互助的教育，
52 民治的意義，
53 教育家的工作，
54 社會的要素，
55 民本政治的基本，
56 教育之心理的要素，
所有杜威在華的系統演講與短篇演講，在演講時，都有人口譯，並有人筆記。筆記經過整理和校正後，隨即發表在日報或雜誌上。杜威在北平的七種系統講演的前五種，曾由北京晨報彙印成書。名曰「杜威五大講演」。此書在出版後兩年中，一共複印十四版之多。七種系統講演，除在日報發表外，並經教育部出版的教育公報刊載。杜威在南京的系統講演三種，都在教育公報刊載。其中教育哲學一種，和在北平演講的教育哲學有別。他的北平的演講，是對一般人的公開演講，內容比較通俗。他在南京講的教育哲學，係對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學生講的，內容比較專門，和他的原先大著「平民主義與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大致相似。他在北平又有另一套關於教育哲學的課間講演，是為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育研究科學生而講的。那套講演係以「平民主義與教育」為藍本。他的講演詞由常道直筆記並參考原著整理後，譯為中文本的「平民主義與教育」，在商務印書館出版。這與上述兩套教育哲學演講，又不相同。

杜威在南京的系統演講，係由南高學生三五人共同紀錄的。除在教育公報發表之外，他們之中也有就個人紀錄，加以整理單獨發表的。如金海觀的教育哲學紀錄，即曾在商務印書館印行。沈振聲則將他取紀錄的三種南京演講，在上海泰東圖書版出版，名曰「杜威三大演講」，與北平的五大演講，遙遙相應。

杜威在北平南京以及其他若干城市的短篇演講，除在當地日報揭載而外，其中有可觀部分，亦曾在「教育公報」刊載。因為全部教育公報現在臺北中央圖書館保存，所以杜威的在華演講，也就保存了一大部分。

上邊曾經說過杜威的演講係經中文口譯、紀錄、整理、並校正後發表的。所有口譯的人，都是了解杜威思想的知名學者，有的還是他的學生。所有紀錄的人，也多是南北學府的高材生。紀錄又多經譯者校閱後才發表，所以其內容的正確可靠，是沒有疑義的。胡適追憶這種傳譯和紀錄的經過，曾如此說：「一些杜威的學生曾經被請將他的講演用中國話口譯。即如我便是他在北京、和山東、山西兩省所有的演講的譯員。為了他的幾套主要演講，我們還挑選了勝任的紀錄員，將每一演講全部紀錄下來交日報與雜誌發表。……杜威對於每一演講，先在他的打字機上打出了簡短要點，然後將此要點分發於他的譯員，使得譯員可以在聽演講和翻譯以前先加以研究並想出適當的中文詞句。在每次演講以後，杜威並將他的演講要點交給挑選了紀錄員，使得他可以在發表以前先將紀錄憑要點核校。我近來在事隔四十

年之後，展讀大部分他的演講的中譯本，還對於這位大思想家教育家清新和誠摯的感覺，他原來對於每次在課堂或對聽者大眾的演講，都是那樣斟酌字酌的。」(二)胡適所描述的在北平、山東、山西、杜威演講、翻譯和紀錄發表的經過，在其他各處的程序，也是大體相同的。即如杜威在南京的全部演講，都是由有名的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哲學教授化學雜誌創辦人之一的劉伯明口譯的，而擔任紀錄的也是他的高材生。

杜威在其他城市的短篇講演，其口譯紀錄和發表程序，也大體相同。例如他一到上海所作的「平民主義與教育」的講演，即是由蔣夢麟口譯由潘公展紀錄的。其正確性當然也是無可置疑的。

三、杜威在華的影響

在杜威離華五十年逝世近二十年之後，要衡量他在中國的影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有幾個原因。第一，要客觀的衡量一個大思想家的影響，須在較長時間以後。我們現在對於杜威還是太接近也太熟習。第二，在杜威訪問以後中國曾經擾攘不安，也經過劇烈的變遷。在這樣劇變的情境之下要衡斷一個思想家的影響也是困難的。第三、杜威的哲學家與教育家的聲名，在最近若干年內，在美國內曾經相當的挫折，要公平的決定他在一個外國的影響，更增困難。第四，杜威的學說，在美國也在中國，往往被推演到極端且發生誤解。在衡定影響時，要把他本人的影響和他的門徒的影響分別開來，是需要很高的辨別力的。

最後，我們還必須面對一種事實，這便是由於中國大陸現在反常的情況，許多有關的資料，學者無法獲得，因而無法對於杜威在華影響，也無法獲得確定的結論。由於上述種種困難，我所要做的，只是儘量從有限可以獲致的資料，以及自身的經驗對於杜威在華影響描述一個大體的輪廓。我不敢說這種敘述是完備的或是成定論的。

杜威對於中國教育的影響比對於中國其他任何方面，都特別顯著。我現在先從他對於中國思想的一般影響入手，然後再特別衡定他對於教育的影響。

杜威對於中國曾有極大的影響，這是大家都承認的，甚至猛烈攻擊杜威的那些共產主義作家也同樣承認。問題在於他的影響究竟如何大？他是怎樣影響中國思想和中國教育的？這些影響所產生的具體結果是什麼？胡適於一九二一年曾經說過，自從中國和西方接觸以來，從沒有一個外國人像杜威對於中國思想有這樣的影響的。(三)我在一九三一年也曾首先論述杜威對於中國教育的影響。我的論述並曾經美國學者稱引的。我曾說：『杜威對於中國教育的影響是一般的，甚至是全面的。影響的發生，由於他在中國停留時對於各大學以及教育家的演講，同樣由於他的著作，幾乎全譯成中文，也由於他的顯要的學生們的宣揚，而他們當時是中國教育界的領袖人物。』(四)何以杜威能對於中國思想與教育有如此的影響呢？他所以能發生影響，首先原於他的來華訪問和演講受中國人熱烈的歡迎。所以如此，第一由於他的偉大的人格；他的知識的真誠，他的熱

心，他的單純的本性，他對於中國人的友好態度以及具有了解的同情——所有他的這些性格都博取了中國智識分子以及一般民衆的敬愛。蔡元培在北京大學給予杜威以名譽博士學位時，曾經把杜威的人格和孔子的人格相比擬。

中國人的敬愛杜威還有另一原因。因為他是一個美國人，是當時對中國友好並曾反對列強瓜分中國的一個友邦的代表。

實用主義本符合中國的注重實用的心理習性，也是使得中國智識分子樂於接受杜威影響的一個因素。中國人和希臘人不同，在中國傳統中從未重視知識本身的價值，從未主張為知識而知識，却重視知識對於道德，社會，政治和文化的實用的價值。

最後，杜威更經由他的舊日學生和信從者的推崇而增加了他的影響。在杜威留華和離華時間，當時有兩所重要學府為杜威影響的主要中心。這便是北方的北京大學和南方的南京高等師範學校。這兩所學府的首長都是杜威的學生。北大大校長是蔣夢麟（先為代理校長），南高校長是郭秉文。當杜威在北平時，他的大弟子胡適使他與新文化運動發生了關係。當他在南京時，郭秉文和南高教育系的同事們，尤其是陶知行和陳鶴琴等人在他們的門徒中傳佈了這位偉大的教育家的影響。有許多教育改革由於他們的努力而發生。所以可以說北大是傳播杜威對於中國思想的影響的大本營，而南高則是傳播杜威對於中國全國教育的影響的廣播站。

在北大與南高而外，還有兩個學府也與傳播

杜威影響有關的，便是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和南開大學，而北高後來的校長李建勛南開當時的校長張伯苓也都是杜威的學生。有這麼多的杜威舊日的學生居着中國教育的高位，無怪杜威受熱烈歡迎而他的學說也經他的範圍逐漸擴大的友生集團的宣傳和實施而發生了普遍的影響。

甚至在杜威抵華以前，中國思想界已為接受他的影響有所準備。新青年雜誌為陳獨秀在一九一五年所創刊，後來胡適成為有力的支持者，在當時已為新思想的輸入開了路。蔣夢麟所創刊和主編的新教育雜誌，誠如蔣夢麟在他的「西潮」中所自述因乃是受了杜威的教育思想的啟發的。新教育確曾標明以「個性發展和社會進步」為主旨的。這雜誌的第三期乃是「杜威專號」。胡適、蔣夢麟、劉伯明，都曾為杜威的演講作口譯，也都曾在此專號分別發表論文將杜威的哲學，倫理學和論理學介紹於中國智識界。還有，胡適在杜威抵華不久以前，也曾對實用主義作了四次演講，演講內容，側重在杜威方面。

在杜威留華期間以及離華以後，有許多全國性的教育團體，也曾經推廣了杜威的影響。中國新教育促進會在杜威來華的同年創立。創辦人為蔡元培、蔣夢麟、陶知行等人。發表此會的主張的刊物，即是上述的新教育雜誌。他們所促進的新教育，如新教育雜誌所標示的，乃是受了杜威的影響的。

全國教育聯合會亦是傳播杜威教育思想的最有力的團體。它是各省教育會的聯合組織而以江蘇省教育會為其核心。它的影響力是很大的。中

國政府有若干改革教育的措施都是根據該會的建議的。

中國教育改進社也是擴展杜威影響的一個有力團體。它的總幹事便是實踐杜威教育理論最力的陶知行。

總而言之：所有以上所述的種種因素如：杜威的人格，杜威之為美國人，杜威的學說和中國人注重實用的性格相契合，他的中國學生居高位，為杜威的訪問和演講已早作準備並擴展其影響，以及各重要社團為傳播杜威思想的通路……等等，一齊配合起來，使杜威的思想易於為中國人所接受而發生了鉅大的影響。

(一) 杜威對於中國思想的影響

要探究杜威對於中國思想的影響，自然應該從他對於中國哲學家的影響開始。可是事出意外，他在中國的影響，惟有在哲學界為最小。前邊曾經說過，他的實用主義合於中國人心理的性質，曾經被中國智識分子用為武器來嚴厲的批判中國文化和中國的價值系統。我們甚至可說杜威的實用主義會被厭惡中國的傳統的人使用，使中國傳統的文化和價值幾於部分摧毀。可是杜威的中國學生之中只有胡適一人是一個實用主義的哲學家，甚至胡適也只重視實用主義為一種方法而不重視它是一種哲學體系。胡適在他的著作之中，也只傳述了杜威早年的和通俗的著作。他雖然在杜威指導之下寫了有關中國論理學的博士論文，但是他後來對於杜威比較嚴正的著作，很少徵引。其原因在於胡適的興趣早已從哲學轉移到史學。他即曾說過有一天哲學家飯碗終將被科學家敲

破的。

在當時各大學教授之中，很少實用主義哲學家。多數的大學哲學系的教授屬於德法哲學學派。縱然中國人有注重實用的習性，縱然胡適在當時學術界有卓越的地位，杜威的實用主義，作為一種哲學體系和純粹的專門學問而論，並沒有贏得中國哲學界的有力的附和。

可是杜威在新文化運動方面的影響是極大的，而新文化運動却創始了孕育了和加強了許多社會的，倫理的和經濟的改革。這運動起始於有名的五四運動，而五四運動則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由一羣學生對於列強處理中國問題感覺失望和憤怒而掀起的一種愛國運動。

杜威在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抵達上海，正當五四運動爆發的前三天。他與這運動的爆發無關。胡適當時在上海忙於接待杜威，也與這運動無關。可是在運動發生以後，學生們漸漸體認到中國政治的不安，經濟的落後和外交的屈辱，都由於中國的文化和傳統不能適應世界的變遷的局面。學生們開始相信古舊的以孔子為中心的文化和傳統必須經過批評也必須改變，而西方的思想和文化則必須接受。

杜威此時來到中國，可說是正得其時而他的實用主義正應合了新文化運動的需要：實用主義一方面是批評中國文化和重行估量它的價值的一種有效的方法，另一方面對於選擇西洋文化以配合中國現狀，也供給了一種有力的刺激。在學生們看來，杜威成為新思潮的象徵也代表對於知識的啓明和領導的一種希望。胡適和他的同調的人

成爲杜威思想的傳導者。由於他們的言論和文字，他們使得一個單純的學生愛國運動轉成爲一種文化改革運動。這種轉變所生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也是極鉅大的：如文學革命，儒家權威的推毀，對於哲學的，政治的，和社會的一切「主義」的虛衷接受，家庭和婚姻制度的改革，傳統價值系統的檢討，以及個人在家庭和社會中地位的改革……等等，都是新文化運動的結果。這些結果，不是杜威，便是他的學生和同調者在演講中和文字中所主張，支持或是鼓勵的。可是杜威對於這些改革的最大的貢獻，乃是在於一種反省思想和批判和評價的方法，而不在于替代傳統的一套新的行動的計畫。

以上很簡短的敘述了杜威對於新文化運動的影響，現在要轉到他在中國政治和社會的趨向所生的影響。杜威在他的演講中主張社會的，政治的和經濟的民主 (Democracy)。他對於放任的個人主義和馬克斯的共產主義，都加以反對。當他提供一個通訊的理想時，他既不主張任何無所不包的「主義」，也沒有貢獻任何具體行動的方案。他的「方法至上」的原則，在他的社會的和政治的思想方面，還是貫徹的。關於這一點，美國華盛頓大學教授 Michael 和 Taylor 說得對。他們說：「杜威的意思是說，民主主義只有在迂緩的歷程中達到而社會的各種目標乃是相對的。他特重科學的措置，而根據時與地的需要，尋求具體方法以解決具體問題，便是他所謂科學的措置」(4) 胡適的一篇論文題目「多談問題少談主義」也即是他的老師的聲音的回響。(5)

在杜威標舉民主的理想並提出個別解決具體問題的方法而外，他對於中國事務的影響，還可以從當時發生的幾件重要事情中體認而得。胡適是接受和實踐杜威的社會和政治的學說的第一人。胡適組織了他的朋友們，共同先後出版了幾種期刊如「每週評論」，「努力週報」和「獨力評論」，鼓吹民主和研究具體的社會與政治問題，多少都以杜威的言論爲準繩。當胡適還是「新青年」的有力支持者的時候，他曾簽名於「新青年」的一篇宣言。這宣言中有一項說：「我們相信尊重自然科學，實驗哲學，破除迷信妄想，是我們現在社會進化的必要條件」(6) 後來成爲共產主義者的李大劍和陳獨秀也都同意這種信念的。其後胡適發表爭取自由的宣言 (一九二〇) 和我們的政治主張 (一九二二) 兩種重要政治文件，簽名的人是一羣知名的知識分子，陳獨秀和李大劍均在其列。這兩種文件顯然也是受了杜威的以民主爲鵠的，以漸進的改革爲達到民主鵠的手段的思想的影響的。雖然胡適直至中日戰爭爆發以後始實際從政，但是他的許多同調的朋友如蔣夢麟和蔣廷黻等人都早已加入政府，使政府的民族主義加上若干杜威的民主主義或自由主義的意味。

杜威對於胡適所領導的這些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以及對於青年學生所生的影響，多少促進了當時北洋政府的崩潰，也同時爲一九二七年國民黨的統一中國，和一九四九年的共產黨攫取大陸鋪路。這種說法，初聽似屬過甚其辭，其實未嘗無事實的根據的。以下便是有關事實的探討。

杜威和國父的關係是中國近代史中很少有人注意的史實。國父從事革命時，他的革命主張，最初遭受同志的心理上的阻碍。他們常用古語「知之匪艱，行之維艱」來阻碍革命的行動。國父爲了克服這種心理上的阻碍，特別著作了「心理建設」一書，鼓吹「知難行易」學說。在出版這部書以前，杜威剛到上海不久。國父曾於一九一九年五月二日與杜威會面，討論知難行易學說。國父在心理建設第四章中，曾叙及此會。他說：「當此書第一版付梓之夕，適杜威博士至滬。予特以此質證之。博士曰：『吾歐美之人只知之爲難耳，未聞行之爲難也。』」杜威後來在他自己的著作和演講裡，也曾多次讚許和解釋國父的知難行易學說。在「來自中國與日本書簡」中，杜威說：「昨天我和前總統孫逸仙博士共進晚餐，發現了他是一位哲學家。他寫了一本書，將要出版。書裡說，中國人的弱點由於相信古語『知之匪艱，行之爲艱。』因此他們不喜歡行動，却認爲得著事理的完全了解是可能的。而日本人的長處，却在於他們甚至不知而行，勇往直前，從錯誤中取得教訓。中國人怕行動發生錯誤，因而袖手不動。所以他爲他的國民寫了一本書，告訴他們『知難行易』。」(7) 不久杜威在一九二〇年的亞細亞雜誌發表一篇文章題目爲 What holds China back。在這一篇文章中，對於與國父討論知難行易學說的經過，亦有相類似的評述。杜威在北京講倫理學時又提及中山的學說。他說：「實行就是求知識。知識要經過實驗的陶鍊，才能正確。中國大政治家孫逸仙先生說『知之匪艱行之維艱』兩句話，貽禍中國不淺

。就是使人怕事偷懶，養成泄沓昏沈之風。這話實在很對。我們雖然不能逆料成敗，却不能不冒險去行。多行一次就多一番經驗。多一番經驗，就增一度知識。所以知識和信仰——一種情緒——有密切的關係。要是信仰，一知便行，行了知識自然增進。要是先求知識的完全，然後去行，恐怕終生也無機會去行呢。英國有句俗話說，陸上學溺水。那些求知不實行的人，就好像學泳不入水。」(2)杜威這番話是知難行易學說最好的註釋。杜威在北京講教育哲學時，也支持知難行易學說。他說：「我聞中國古代有『知之匪艱，行之維艱』的話。試驗的方法，却與之相反。這是有行然後可以知。沒有動作，便沒有真的知識。有了動作，然後可以發現新的條理的知識，以及從前未發揮的知識。故曰：『沒有行，決不能有真的知』。」(3)

國父的知行學說本與杜威的實用主義的知識論，有好多契合之點，無怪杜威在其言論與文字中再三推崇。而在國父撰著「孫文學說」之時，也正是他籌思改組中國國民黨的前夕。他的革命學說經過與杜威相「質證」，而得着杜威的理解與支持，因而格外增加了自信心，這對於革命的成功，不無鼓勵作用，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同時國父的信徒，同志，和一般革命青年，由於杜威的推崇，國父革命學說，也增強了追隨。國父從事冒險革命的決心，因而引致了消滅軍閥，統一中國的成功，也可推想而知的。

杜威對於國民革命，另有一種貢獻。前邊說過，由於杜威的同情、支持，和鼓勵，五四運動

轉變為新文化運動。可是由時勢的推移，許多青年漸漸感覺到文化的革新還不夠，如要達到杜威所揭示的民主的理想，還要進一步採取實際行動。國父明白這時青年的心理，便利用機會吸收革命同志。他一面促令國民黨的海外黨員支持新文化運動，一面竭力運用這個運動，使有助於國民革命。其結果是在國民黨改組與黃埔軍校成立之後，大批青年學生都湧往廣州參加了革命陣營。對於後來國民革命的成功，杜威的啓導青年思想，不無間接鋪路的作用，是不能否認的。

說到杜威在華演講與後來中國共產黨的崛起，有何關係，這問題便比較複雜。要澈底追溯其關係，可能需要寫一專篇或是一本專書。可是我們也可就大體而論，不必追求細節。大體說來，我們可以安全的講，杜威在華時期，他的影響既便利了，也延緩了，中國的共產主義的運動。

王若水會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廿八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標題為「五四運動中的胡適和杜威。」對於這篇文章，T. S. Sun 曾在美國發表英文摘要。其內容大意是說「杜威受了胡適的邀請周遊中國，爲了是要阻遏這時中國知識分子中方興的馬克思主義思潮。杜威被控爲試圖奪離中國知識分子對於政治的興趣，並且影響他們以改良主義代替革命。」(4)在一九五五年三月三日另一共產主義者陰法魯在光明日報的第五十一期副刊「史學」發表一文，題目爲：「胡適、杜威、和羅素怎樣開始破壞中國新文化運動的？」T. S. Sun 所作此文的摘要說：「胡適正當五四運動席捲全國之時邀請杜威到中國各處演講，

其目的在於扼殺中國知識分子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興趣的萌芽。」(5)黃陰兩人所說，雖然誇張，但也不完全誣妄。當杜威於一九一九年五月抵達中國時，中國當時還沒有組織的馬克思主義的活動，直到同年的十二月社會主義研究會方始成立。但是在同一月，上文所提到的新青年宣言，陳獨秀、李大釗都會簽名的，却擁護實用主義的哲學。這完全表明了杜威對於後來的中國共產黨創始人已發生了影響。周策縱曾說：「作爲一種哲學也作爲一種科學方法的試驗主義在這一時期勝過辯證的唯物論。階級級鬥爭的觀念在此時也是爲陳獨秀及其他多數中國領袖所排斥的。」(6)

根據杜威對於美國民治的分析，以及他對於中國傳統的同業聯合的推許(7)，陳獨秀甚至提倡以地方自治和同業聯合兩種小組織爲實行中國民治的基礎(8)雖然即在發表這種主張的次年(一九二〇)陳獨秀已和李大釗創立了中國共產黨，可是杜威確曾對於中國早年的共產主義有延阻的影響，是不可否認的。

杜威的影響雖然不足以阻止陳獨秀和李大釗等人轉向共產主義，但是他的理論和他的個人的接觸却會勸阻了若干中國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參加共產運動。他在他的演講裏明白表示了他的反共立場，並且公開批評馬克思主義(9)杜威在福建的一個講演中，譴責共產主義者的忽視批判的思想和盲目服從。(10)他的反共的嚴厲的言論，確有「扼殺中國知識分子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興趣的萌芽」的效果。胡適和他的一組同調的人在二一九二一年的脫離新青年，充分反映了自由主義者和陳

李所領導的共產主義者的分裂。胡適的主張「好人政府」以及他的創刊努力週報，宣布了和階級鬭爭與革命暴力相反的改良主義。後來不少的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和胡適本人先後參加了國民政府。他們的榜樣吸引了許多其他的知識分子和學生，使他們從馬克斯主義轉向，這樣便會對於共產黨的得勢，發生了一種暫時的抑止的作用。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肯定我在上文所說，共產黨控訴杜威阻遏了馬克斯主義初期在中國的發展，雖不免誇張，却也有若干真理存乎其中。

杜威、胡適，以及其他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雖然在抑制共產主義的迅速傳播方面，有一時的影響，但是最後還是無能為力。在全世界內，共產黨都是很巧妙的把民主和自由的口號轉為己用，而一旦當權以後便永遠的壓制民主與自由。中國共產黨的清算杜威的影響和杜威的隨從者，不過是他們政權取得的邏輯的結果而已。

中國大陸的共產黨正攻擊杜威對於中國共產運動扮演了反動的角色，而在臺灣却有一部分人士責備杜威因鼓勵新文化運動，摧毀中國固有文化而助長了共產主義的傳播，以致為共產黨的攫取大陸開了路。這些人士認為新文化運動所採用的杜威的實用主義方法，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解體，應負責任。在新文化運動中從事消極的批判的人，並沒有提出新的思想體系或行動方案來代替他們所摧毀的舊傳統。其實結果是思想的闕門大開，西方的各種思潮都湧進來。共產黨便乘機利用新文化運動所造成的文化真空以及青年好新驚奇的狂熱而使中國青年皈依了共產主義，造

成大陸的淪陷。(甲)

以上對於杜威的批判，有一點對於杜威是欠公平的。杜威本人和他的若干極端的信徒不同，從沒有主張全盤摧毀中國文化，也沒有主張全盤西化。相反的，他主張對於舊文化作批判的評價，而對於西方文化作審慎的考驗。他希望從此種反省思想的程序可以產生一種吸取了中西文化的優點的新文化。(乙)

可是在上述對於杜威的批評中，却也有一部分的真埋。杜威和他的門徒把一種極有效力的批評舊文化傳統的方法交付於中國青年手中而沒有提示他們任何一種新的思想和價值的體系，使他們可根據這體系以訂立政治與社會改造的方案。共產黨人從此便開始輸入他們自己的涵蓋一切的哲學與政治的體系，逐漸贏得了中國青年的信仰。杜威雖然曾經警告中國青年對於外來思想不可作無分別的接受和付諸實施，也擋不住這個狂潮。在這一點，Michael 和 Taylor 的說法，是確實的。他們說：「和杜威的普及的社會哲學相反，共產主義的理論供給中國知識分子以號稱科學的，也是以唯物主義的反形而上主義解釋人生的一種體系，也賦予了青年優秀分子一程歷史性的確定任務。」他們繼續說：「實用主義者有助於在後來數十年中為唯物主義的傳播鋪路。由於參加攻擊孔子之道，他們貶抑了傳統的價值體系。但是他們自己並沒有提出任何價值體系。他們只主張依據杜威所說的當時與此地的緊急需要而逐個解決問題。由於實用主義者自身傾向於物質主義的和功利主義的解釋，他們對於共產主義

的理論便少有抵抗力。」(丙)

從以上的敘述和分析，我認為可以達到我在上文所說的「杜威在華所生的影響，便利了也延緩了中國共產主義的運動」的似乎表面矛盾而其實不然的結論。

(乙)杜威對於中國教育的影響

在所有西方教育家之中，以杜威對於中國教育的影響為最大，這是毫無疑義的。他對於中國思想，政治，和社會的影響也許可成為爭議而不能解決的問題，而他對於中國教育的影響，則是確實無疑義而且是可以分條列舉的。

如以上所說杜威在哥倫比亞大學的舊日學生，在中國教育界居有重要位置。其中主要的有蔣夢麟郭秉父陶知行陳鶴琴等人。蔣夢麟起先主編新教育雜誌，繼而任北京大學校長及教育部長，對於推廣杜威在中國教育方面的影響，有相當貢獻。郭、陶、陳、三位教育家在杜威訪華時，則在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分任校長，教育系主任及教育系教授職務。他們根據杜威的思想來訓練中學和師範學校的教師而這些未來的教師畢業後又在他們所服務的學校或教育行政機構推廣杜威的影響。因此杜威的影響便從大學階段逐漸擴散至於中學和小學教育。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為複射中心，杜威的影響遂及於中國整個教育界。

在杜威舊日學生之中，傳播杜威影響於中國教育界最有實際力量的陶知行和陳鶴琴，值得特別指述，因為他們以杜威的教育學說為出發點而發展成他們自己的體系。

陶知行的教育理論和實施，可說是代表杜威

思想的極端。陶知行對於推廣杜威教育影響的貢獻，在杜威門弟子中，只有克伯屈 (William Kilpatrick) 可與相比。從他在南京任教至一四六六年逝世，陶氏完全獻身於中國教育的改革。他是杜威中國門弟子中第一個根據師說而自創教育理論與實施的體系的。也是第一個將杜威的影響由大學推廣到下層的鄉村學校的。

陶知行所提倡的「活教育」，乃是杜威的以經驗為中心的教育的一支派。他說：「什麼是活教育？活教育是生活中心教育……沒有生活中心工作的教育是死教育。沒有生活中心的活動的學校是死學校。沒有生活中心教材的課本是死課本。辦死教育，開死學校利用死課本的人是死人。」

(三)

陶知行又主張了「教學做合一」的原則。依他的理論，「教」只是「教」學生從「做」中「學」的一種藝術。惟有在生活的動境內，施行「教」「學」「做」三者合一的教育方法，才有活教育的存在。

在實施方面，陶知行在南京近郊所創辦的曉莊師範學校，即是杜威的一般教育理想和他本人所發展的教育體系的具體示範，其影響則推及許多師範學校及鄉村學校。

另一杜威弟子陳鶴琴乃是陶知行的同事，朋友也是同志。陳鶴琴在革新上海租界小學教育方面有所盡力，後來又從幼稚師範教育，使杜威影響下達幼稚園教育。

陳鶴琴傳播和實施杜威教育學說很為出力，以致在中國共產黨在大陸當權以後被迫作公開發

言打擊杜威對於中國的影響。在他的公開坦白中，他說：「作爲一個教育工作者，作爲一個曾經中過杜威實用主義反動教育思想毒素很深的中國留學生，作爲一個曾經替杜威在中國傳播過實用主義教育思想響影的傳聲筒的我，要在這裡向這個近代教育史上的教育界大騙子杜威作嚴厲的控訴」(四)

關於陳鶴琴對於杜威的控訴，後文還要細說，但是從以上陳的自白，已可見陳對於推廣杜威對中國教育的影響出力之多了。

上文提到，我會說過，杜威對於中國教育的影響是普汎的和全面的。這種說法驟聽或疑其誇大，其實只是本質的敘述並未渲染過實。讓我再列舉事實來證明。先從教育理論說起。

在當時，杜威的教育哲學爲中國所有的高等師範學校和大學教育系所接受。他的劃時代著作「民本主義與教育」被採用爲教本或參考書。他的主要著作有十多種被譯爲中文，而翻譯者多數爲教育學家而非專業的哲學家。杜威的同一著作甚至有幾種中譯本(四)

有極多的期刊論文，專書和小冊出版以介紹杜威的教育哲學。杜威常說的有關教育的警句如「教育是生活」，「學校即社會」「從做中學」「教育爲了生活的需要」等等，乃是全中國各教育階層人士所耳熟能詳的，甚至有時成爲口頭禪。在杜威留華以及離華後若干年間，中國教育界對他的文字和言論，從未聞有相反的意見。他成爲當時中國的最高教育權威。

在教育實施方面，有很多新改革和新措施是

反映杜威的影響的。以下列舉其中顯著的幾種。

(1) 中國教育目的曾經根據杜威的見解重新考慮。一九一九年四月教育部所召集的教育調查會第一次會議出席的會員有全由教育部指聘的六十位教育界知名人士其中包括蔡元培蔣夢麟等人。會中不滿意於舊有的教育宗旨，認爲不合民本主義的潮流，乃提議以「養成健全人格發展共和精神」爲教育宗旨。(四)同年，全國教育聯合會開第五次年會通過贊成教育調查會的提議，甚至更進一步根據杜威的「教育本身以來無目的，教育本身即是目的」的見解而主張「施教育者不應特定一種宗旨，或主義以束縛受教育者」並呈請教育部廢止教育宗旨，宣布「養成健全人格，發揮共和精神」二語爲教育本義。(四)

教育部在一九二二年制訂新學制系統改革令。根據上述兩教育團體的建議，在改革令中略去教育宗旨或教育目的，只提出教育準則七條(見後)。(四)這種改變，顯然表示杜威關於教育目的的理論，發生了實際影響。

(2) 新學制系統完全採取了美國制度。當杜威在華時間全國教育聯合會即曾建議改革學制系統，並由教育部指派一個委員會加以討論。一九二二年教育部即公布了上述的新學制系統改革令。這一法令爲中國教育劃出一個新紀元，也充分表示了美國的特別是杜威的影響。這新學制系統是採取美國當時所盛倡的六—三—三制的，而所公布的七條教育準則如下爲列：

1. 適應社會之進化；
2. 發揮平民教育精神

3. 謀個性之發展
 4. 注意國民經濟力
 5. 注意生活教育
 6. 使教育易於普及
 7. 多留各地方伸縮餘地

這七條教育準則很顯然反映杜氏在華講演以及所發表的文字中所主張的理論。

(3) 改組課程以兒童為中心。一九二二年全國教育聯合會開會於濟南討論學制改革與課程改組。胡適曾參加此會。據他追述，會中對於新學制建議的第四條是：「兒童是教育的中心。在改革學制時必須特重注意兒童的個性差異。因此中等與高等教育必須採選課制，而對於所有小學的分班與升班必須採彈性原則」。胡適評論這個建議，續說：「在一九二三年頒布一九二九年修正的新課程中，兒童為學校的中心這一觀念是特別注重的。杜威哲學的影響很容易從課程改訂中看出。」(四) 在新學制系統改革會中雖然沒有用「兒童中心」的字樣，但兒童中心教育的精神，實是貫注在全系統之內的。

一九二四年 國父改組中國國民黨以後，黨宣布了政綱。這政綱的第十三條便是「促進兒童中心教育」。在國民黨於廣州成立政府以後，曾一度實行這一條政綱。這表示兒童中心主義在當時中國儘管南北政府有政見的差異，都是奉為教育的準則的。

(4) 根據實用主義的新教學法被採用。全國教育聯合會第五次會議建議以杜威的主張為改革教育學法的指導原則(五)在一九二一年的會議中全國教

育聯合會具體主張在小學推行設計教學法(六)後來為了推進設計教學法的實施，克伯屈曾被邀請到中國演講。

(6) 實驗學校紛紛成立。以杜威在芝加哥所創設的實驗學校為模範，中國有許多實驗學校在杜威訪華後紛紛設立。第一所實驗學校值得特別提及的，便是俞子夷所主持的南京高等師範學校附屬小學。他首先採用設計教學法，並根據兒童中心的原则改組課程使南高附小轉變為中國第一所實驗學校。這所學校漸成為杜威式的實驗學校的範本。各地小學教育人士，紛紛來校參觀，回去以後對於這種新教法新課程很多加以模仿，使各地小學多少具有實驗性質，而若干省份著名的師範學校附屬小學，甚至都改稱為實驗學校(七)。

(6) 提倡學生自治，作為德育的一種措施。杜威曾在演講中讚許學生自治制度(八)在他的影響下，全國教育聯合會在一九二〇年曾經建議了學生自治實施的準則(九)在它的一九二二年的會議中，重新肯定學生自治為德育的目標之一。(十)其結果是在各級學校學生自治盛極一時，甚至趨向極端，引起學潮。後來會有人將學潮歸咎於杜威學說(十一)。

(7) 文學革命以及小學採用白話文課本的提倡。杜威在他的演講中大力支持胡適所倡導的文學革命(十二)，當全國教育聯合會在一九一九年會議中通過小學校用白話文課本的決議時，杜威會加以讚許，認為小學課本用白話文書寫，乃是中國教育的一大進步(十三)。

一九二〇年教育部即修改小學教育法，在十

三條和十五條中，將原文「國文」，改為「國語」(十四)。教育部並命令自一九二〇年秋季起小學應採用國語課本(十五)。同年，商務印書館發行二十套以白話文寫的課本(十六)。

在一九二五年教育部通令全國初級小學各科的課本，一律須用白話文編寫(十七)。同年，江蘇浙江安徽三省師範學校附屬的小學聯合會通過一個決議，將所有用文言編寫的小學課本一律焚燬，以示從此根絕文言文小學課本的決心(十八)。自此以後，所有小學課本都是用白話文寫的，不再用文言。

從以上具體事例的列舉，我們可以作結論說，杜威對於中國教育的影響，實是普遍而徹底的。

四、杜威在華影響的挫折

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五年，杜威支配中國一般思想以及中國教育，甚至到了不可置信的程度。杜威的思想確實代表當時中國的主要思潮。很少人對於他的哲學有所疑問，甚至他的教育方面的隨從者把他的主張推行到極端，發生了流弊而引起批評，也少受一般人的注意。

可是自一九二五年上海的五卅慘案發生以後，杜威的影響已有開始降落的趨勢。由於對外的失望與屈辱，當時有許多教育人士對於支配當時思潮和教育實施的大同主義和個人主義的趨勢，感覺不滿。他們主張保存和發揚民族文化並培養民族意識，而倡導一種國家主義運動。過去宣揚和提倡實行杜威的教育哲學的全國教育聯合會受

了這新運動的影響在後來幾次的會議中，逐漸改變了教育的重點，甚至中華教育改進社還議決了明定教育宗旨案，而以注重本國文化以發揮民族精神等點為宗旨。當時雖然還沒有人明白主張推翻杜威的權威，但是其影響已開始降低。在民國十六年，中國國民黨統一全國成立國民政府以後，杜威的影響，便更受挫折了。

雖然 國父的革命學說和杜威的實用主義的方法相契合，但是 國父對於新文化運動的反孔趨向並不同情。他的三民主義要求發揚民族精神以保證國家的統一和獨立。國父的信徒在獲得政權以後便從事於恢復孔子的權威，重訂教育宗旨，改進課程，重編教科書，一切以三民主義為最高準則。國民政府於一九二八年公布教育宗旨如下：(圖)

恢復民族精神，發揚固有文化，提高國民道德，鍛鍊國民體格，普及科學知識，培養藝術興趣，以實現民族主義。

灌輸政治知識，養成運用四權之能力，闡明自由界限，養成服從法律之習慣，宣揚平等精義，增進服務社會之道德，訓練組成能力，增進團體協作的精神，以實現民權主義。

養成勞動習慣，增高生產技能，推廣科學之應用，提倡經濟利益之調和，以實現民生主義。

提倡國際正義，涵養人類同情，期由民族自決進於世界大同。

從以上教育宗旨，可見教育之全體精神和着重點和杜威教育哲學顯然不同。中國教育在大陸上從一九二七年直到一九四九年中共取得政權為

止，教育的理想與實施，都是根據這三民主義的教育宗旨的，在中國政府遷設臺灣以後，一切教育也皆以三民主義為依歸。因此杜威的影響，在五卅慘案以後繼續受挫抑直至現在。

在中共執政後的中國大陸，杜威所受的打擊更重。在自由中國，杜威思想雖不如前盛行，但是很少受公開的攻擊，在中國大陸的情形，却大不相同。中共首先從蘇俄的先例對於杜威的哲學與教育理論加以清算。在一九五〇年十月號的「人民教育」雜誌上首先指明杜威對於中國教育的影響。雜誌上說：「假使我們批判舊教育思想，我們首先要批判杜威。第一、杜威的教育理論支配了中國教育三十年。他的社會哲學和一般哲學在一部分中國人中間也有一定的影響。」(圖)這段話中却是很正確的事實的敘述。「上海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在一九五一年出版了「杜威批判導言」。在批判杜威而外，他們並批判他的大弟子胡適。只在一九五四和一九五五年兩年中清算胡適思想的文字有三百萬言之多。批判胡適常是連帶到批判杜威，因為他們把杜威思想認作胡適思想的根源。

在中國大陸，打擊杜威思想最激烈的，是他自己的門徒陳鶴琴。他在「江蘇省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發言說：「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毒素究竟是怎樣散佈在中國的？主要地是通過杜威自己來華講學，宣揚他的實用主義哲學和反動的教育思想；通過杜威當年一個反動思想大本營之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學生留學在那裏的經常有二三百人之多，從辛亥革命起一直到解放

以前，這三十多年來，上萬的中國留學生帶回來杜威反動實用主義觀唯心論思想和杜威反動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其中最顯著的要算……胡適了。因此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在中國教育界曾經起過廣泛的影響。」(圖)

陳鶴琴自己敘述他「中毒」的經過，說他中了杜威三槍。第一槍是杜威的教育目的論。他說：「杜威為要掩蔽教育的階級性，騙我說：『教育就是生長，』他說，『教育只是生長，除它自身之外，沒有別的目的。』」(圖)陳又說杜威打中了他第二槍，這便是杜威的「兒童中心課程論」。他根據這理論，發展他自己的「活教育」的觀念，從自然與社會界採取活教材，但沒有加以組織。這些科目，只是支支節節的教給學生，毫無組織。他自己譴責自己說：「『活教育』的兒童中心課程論是嚴重地破壞了科學知識的系統性，計劃性和組織性，降低了教師的主導作用地位，妨礙了兒童掌握科學知識改造世界的可能性，從而消磨了兒童、青年為建設祖國，保衛和平的革命意志。」(圖)

陳認為被杜威所中的第三槍是「兒童中心教學方法論」。陳自承從杜威的這種教學方法，發展成他自己的「做中學，做中教，做中求進步」教學方法論。他自己的方法，還只是陶行知的教學做合一教學法之一種。他對於杜威和他自己的方法，批判說：「杜威的從做中學的做和活教育的從做中學，做中教的『做』並不是馬列主義的『實踐』。馬列主義的實踐是有社會性，是有目的的……杜威實用主義教學方法論只是獲得零碎

、片面，割裂的知識的實踐；杜威實用主義教學方法論只是企圖達到掩蓋教育階級性『教育即生長』的目的的實踐；杜威實用主義教學方法論的實踐，只是使青年一代為美國壟斷資本家做忠實奴才的實踐。」¹ 陳鶴琴把他的活教育方法的失敗歸咎於杜威的實用主義的教學法，認為他是杜威的第三槍的犧牲者。

中共對於陳鶴琴如此攻擊和詆毀杜威，還未滿意。還要求他對於杜威教育學說的哲學基礎，加以檢討和攻擊。因此陳對於杜氏的哲學基礎，實用主義也還擊了三槍。依陳的分析，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體系表現在三個方面：「一、他的唯物主義的經驗論，二、他的生物化的人性論，三、他的庸俗進化論的社會觀。」² 陳認為「從他的唯物主義的經驗論，杜威演化出他的狹隘的經驗主義的『從做中學』的兒童中心教學法；從他的生物化的人性論，杜威演化出他的反動的『教育即生長』的兒童中心教育目的論；從他的庸俗進化論的社會觀，杜威演化出他的反科學的『學校即社會』的兒童中心課程論。」³ 陳的三槍便回擊在這三方面。

陳對於杜威哲學的攻擊，載在他所著的「批判杜威反動教育學的哲學基礎」一小冊之中。從哲學觀點來說這是一本比較專門性的一冊。從陳過去的學術修養而論，陳是否真正是這本一小冊的著作人，至少是可疑的。這一冊子是從正統的馬列主義的立場攻擊杜威哲學的，內中比蘇共作家對於杜威的類似攻擊，並無多新義，值不得儘述。可是有一點值得指明的，即是從共黨對於杜

威如此嚴厲的攻擊，足以表明杜威對於中國思想和教育的影響是如何的鉅大，而斷絕它的根株，在他們看來是如何的必要。

從以上所論，我們可以看到不但共產的中國大陸，也在一九二五年到一九四九年的中國，以及今天中華民國政府所在地的臺灣，杜威的影響，都受了挫折。可是杜威的影響，雖在中華民國和共產大陸同受挫折，其性質和程度，則大不相同。在共產大陸乃是對於杜威思想正面的攻擊，對於他的影響，要根本廓清，斷絕根株。這由於觀念形態的根本衝突，不能相容。在現狀之下，杜威思想將再無發生影響之可能。至於在中華民國，雖然幾十年來因時勢的激盪國家主義和三民主義思想的興起，在注重固有文化，發揚民族精神，加強團體訓練，範圍個人自由等方面趨重。但是對於杜威主義，只是對其不足方面，加以補充，對其極端趨勢，加以改正，並非正面衝突，也少公開的嚴厲攻擊，和大陸清算和摧毀杜威影響的情形，未可相提並論。

更就積極方面來說，我國現時教育與文化政策，注重倫理民主與科學三要項。其中民主與科學兩項，仍是杜威學說中所重視的。關於民主精神的發揚，反省的思想，科學的方法的學習，所有杜威的見解，還有許多可以取法的地方。至於生活教育的提倡和杜威的實用主義的課程和方法，也有互相發明之點。還有，一九二二年所頒布的會受杜威影響的新學制，其大體仍在臺灣繼續實施。至於近十多年來在臺灣設立的國民學校教師講習會，每年調訓教師，直到現時，已有近兩

萬人之數。這講習會的主持人和講師大都是崇奉杜威的教育理想和學說的。他們所訓練出的兩萬國民學校教師，對於繼續和推廣杜威的影響，也是未可小視的。

從以上的觀察，可以見到杜威學說，雖受挫折，但在自由民主的中華民國，如能經過教育者正確的解釋，適當的補充，和審慎的推行，未嘗沒有復興的希望與光輝的前途。(完)

註釋

一、這些講題是 Barry Keenan 所調查和紀錄的，將在我 and Robert Clifton 合譯的杜威演講英譯本副錄中刊載。

二、Hu Shih, "Dewey in China", in *Philosophy and Culture: East and West*, edited by Charles A. Moore, University of Hawaii, 1962, p. 76-65.

三、參閱胡適文存第一期第二卷（民國十年）第五三五頁。

四、見 Ou Tsuin-chen, *La Pédagogique de John Dewey*, 2nd edition. (Paris: Vrin, 1958) P. 251 Thomas Berry 曾在 gohn Blewett 所編的 gohn Dewey: His Thought and Influence 中用英文譯引原文。

五、蔣夢麟，西潮，第一一八頁。

六、參閱吳俊升，教育哲學大綱第九頁。

七、Franz H. Michael and George E.

- Taylor: *The Far East in the Modern World*, p. 232, N. Y. Henry Holt, 1956.
- 八、每週評論，民國八年七月廿日。
- 九、「本誌宣言」，新青年第七卷第一號，八年十二月一日。
- 十、Evelyn Dewey, (Ed.) *Letters from China and Japan*, New York, Button, p. 166, 1920.
- 十一、晨報社杜威五大講演（一九一〇）第四四七頁。
- 十二、同上，第一九八頁。
- 十三、Historical Abstracts, 1955 No. 1560.
- 十四、Ibid, 1955 No. 3366.
- 十五、Chow Tze-Tsung, *The Juay Fourth Movement* (Harvard, 1960) p. 176.
- 十六、五大講演第六四頁
- 十七、新青年第七卷第一期，八年十二月一日，第十三頁。
- 十八、五大講演五七——六五頁
- 十九、杜威講「習慣與思想」，載民國十年教育公報第十期三四——四一頁。
- 二十、臺灣出版的學粹雜誌，常有此言論。
- 廿一、「習慣與思想」，教育公報第十期第三九——四一頁。
- 廿二、Michael and Taylor, *op. Cit.*, p.p. 232-235.
- 廿三、原文載中華教育界十九年十月號。此處
- 從朱若潛的博士論文 *Tas Hsing-Chi and Chinese Education* p. 92,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轉引。
- 廿四、陳鶴琴，批判杜威反動教育學的哲學基礎，第四十五頁。上海新知識出版社出版，一九五六年。
- 廿五、杜威的著作有中譯本的，有下列諸種：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School of Society*, *The Child and the Curriculum*, *My Pedagogic Creed* (兩譯本) *School of To-morrow*, *Freedom and Culture* (兩譯本)，*Sources of a Science of Education* (兩譯本)，*Education To-day*, *Re-constitution in Philosophy* (兩譯本) *Ethics*, *How We Think* (三譯本)，*Moral Principle in Education*, *Experience and Education* (兩譯本)
- 廿六、舒新城，現代中國教育史料第二冊，第一一三——一二〇頁。
- 廿七、同上書第二十頁。
- 廿八、教育公報第十期，民國十一年。
- 廿九、原文見 Hu Shih, "Dewey in China", p.p. 765-66 此係據原文中譯。
- 卅、教育雜誌民國八年第十一期，第一〇八頁。
- 卅一、同上，民國十年第十一期。
- 卅二、見余子夷，一個小學十年努力記，民國十七年中華書局出版。
- 卅三、杜威講「學生生活組織」，見教育公報民國九年第十期，五一——五三頁。
- 卅四、中國教育七十年記事，商務印書館十四年出版，一〇九——一一〇頁。
- 卅五、China Year Book, 1923 p. 1900 Peking, Tientzin: Tientzin Press, 1923.
- 卅六、蔣夢麟，西潮，二二八——二九頁。
- 卅七、五大演講，第二五一頁。
- 卅八、同上，第一五八頁。
- 卅九、教育公報十九年第二期第七頁。
- 四十、Cyrus H. Peake, *Nationalism and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2) p. 143.
- 四十一、中國教育七十年記事，第八九頁。
- 四十二、教育公報十四年第二期第二頁。
- 四十三、教育雜誌，十四年第一期。
- 四十四、陳啓天，最近卅年中國教育史，二〇五——一六頁，五十一年文星書局出版。
- 四十五、曹孚，「杜威批判論」，「人民教育」第一卷第六期，一九五〇年十月。
- 四十六、陳鶴琴，前引書，四四頁。
- 四十七、同上，四四——四八頁。
- 四十八、同上，四六頁。
- 四十九、同上，四七頁。
- 五十、同上，序言